

辗转的教育

——异地借读与教育获得

季春梅 著

EDUCATION

辗转的教育

——异地借读与教育获得

季春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辗转的教育：异地借读与教育获得 / 季春梅著.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651-3652-8

I. ①辗… II. ①季… III. ①义务教育—教育资源—
研究—中国 IV. ①G5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8446 号

书 名	辗转的教育——异地借读与教育获得
作 者	季春梅
责任编辑	王 艳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 9 号(邮编:210016)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652-8
定 价	39.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 言

教育是现代社会通往成功的阶梯,教育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因而教育问题成为当下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教育的梯度性决定了基础教育对个人成长尤为重要,但高考指挥棒的传递效应使得中国的基础教育易被纳入应试教育的轨道。长期以来,围绕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而对中国教育的结构因素、动力机制、城乡关系及之间的张力等始终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教育代表素质教育,县城教育代表应试教育,为什么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会放弃优质城市教育资源而让孩子“辗转”到县城接受教育?如果说普通大众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诸多误解而可能出现非理性的盲动的話,为什么身在教育圈的学生家长也做出类似的抉择?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理性地去思考。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教育公平之路,无疑是一段错综复杂和问题重重的艰难历程。如果没有“结构—过程”互构的视角,没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探索,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研究是难以清晰地回答上述问题的。

季春梅博士以社会学视角切入所研究的主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S省H县H中学里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异地借读过程的分析,再现了20世纪末以来中国教育场域中的一个实际面相与国家—学校—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关系的实践过程,力图还原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动与互动,从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为子女的教育选择与教育获得中呈现政府—学校—家庭之间的资源转换机制,并从中洞悉“异地借读”的运作逻辑,为读者讲述了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为子女在县城获得优质教

育资源的过程以及结果的故事。

从季春梅博士的研究中读者可以获知,中国的基础教育并非简单的城市“素质教育”与县城“应试教育”,事实上,在利益相关者资源转换嵌套的背景下,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有着纯粹的教育定义。从这层意义来说,如果城市教育并非真正的素质教育,而县城教育也绝非纯粹的应试教育时,教育的“辗转”就此形成。而异地借读的结果是城市子女的成才、成人以及对农村教育的挤出。由此可见,异地借读所反映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绝不是单纯的教育现象或教育公平问题,而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季春梅博士的研究成果具有如下两大特点:一是不仅仅把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当作简单的量化统计指标,而是以更丰富、更宽广的视角对“教育获得”的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等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二是不仅仅把异地借读带来的教育不公视作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而是通过深入考察,以具体而全面、生动而理性的问题揭示与反思,体现出更为具体的现实和人道意义,对当前教育公平的研究有着切实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实际困境要远大于社会关注程度的情境下,季春梅博士的研究成果或许不会成为吸引大众目光的畅销书,但却一定是对教育公平具体而全面、生动而理性的反思结果与学术成果。

陈友华

2018年2月20日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

序 言	001
第一章 导 论	00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003
第二节 研究背景	006
第三节 研究可行性与研究意义	013
第四节 研究设计	016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023
第一节 教育获得的国外相关研究	025
第二节 教育获得的国内相关研究	034
第三节 教育作为社会地位获得工具的研究	045
第四节 相关理论	051
第三章 关于异地借读的初始叙述	059
第一节 一段辗转的经历	062
第二节 县城的最高学府	070
第三节 尴尬的城市教育	083
第四章 异地借读与城市家庭的教育选择	093
第一节 城市家庭对子女学业的期望	095
第二节 城市家庭对子女品性的期望	101

第三节 影响城市家庭教育期望的因素·····	107
第四节 城市家庭的教育选择·····	119
第五章 异地借读与城市学生的进入·····	123
第一节 城市学生的县中适应状况·····	126
第二节 城市家庭对子女适应的影响·····	135
第六章 异地借读与资源转换·····	143
第一节 政府:影响异地借读的制度资源·····	146
第二节 学校:影响异地借读的组织资源·····	156
第三节 县中的教师:影响异地借读的人力资源·····	164
第四节 城市家长:影响异地借读的社会资源·····	172
第七章 异地借读的结果·····	187
第一节 成“才”和成“人”·····	189
第二节 对农村教育的挤压·····	196
第八章 结 语·····	201
第一节 结 论·····	203
第二节 讨 论·····	210
参考文献·····	216
附录 1: H 中学津贴发放标准·····	225
附录 2: 访谈城市家长情况表·····	229
后 记·····	23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引言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发现:虽然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迅速攀升,但高等院校,尤其是重点高等院校的农村学生的比例却越来越低。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不断滑落。在重点高校里,中产阶层子女的人数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人数的 17 倍,而农村学生的比例则更低,他们更多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余秀兰^①对南京大学 2002 级 9 个学院 19 个系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生源地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占 22%,来自城市和县镇的学生占 78%;从大学生父母职业类别看,父亲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的只占 16.6%,母亲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的只占 20.7%。另外,根据 2004 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 34 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的调查: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 7.9%与 5.6%。刘云杉等^②统计发现:1978—1998 年间来自农村的北京大学学生比例约占三成,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下滑,自 2000 年至今,考上北京大学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另外,清华大学 2010 级农村学生也仅占 17%。总之,此类研究均用理性的数据表明,在重点高等院校中,城市中产阶层子女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与农村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严重失衡,高等院校尤其是重点高等院校中,来自

① 余秀兰. 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221.

② 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 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5).

农村的学生的比例远小于农村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

对于以上的研究结果,很多分析认为主要是和近年来高考所出台的各项新政策,如加分、保送、自主招生等有关,从而使那些富有竞争力的重点高中的实力越来越强。例如,在全国一共十多所外国语学校,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可以通过保送直接进入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另外,对陕西省的超级中学调查显示,在2010年,西安市五所名校的学生占据了清华和北大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总数的98.9%与保送名额总数的97.3%。杨东平分析认为,“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高考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①。那么,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高考政策的调整、超级学校的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过去常说的“龙生龙凤生凤”以及现在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等的出现之间有关联吗?

二、问题提出

笔者的大学以及研究生都是在家乡(文中称N市)所在的省城(文中称J市,省份为S省)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则留在省城的一所教育院校工作。笔者家乡N市的基础教育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有着非常突出的成绩和广泛的影响。21世纪初的时候,出现了城市里的学生到N市县里的重点高中借读的现象。^②在省城,笔者经常看到周围的同事、亲戚或朋友(他们或是医生,或是公务员,或是大学教授)将他们

^① 林清云. 读者文摘精华[M].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18.

^② 这里的“借读”与我们常提起的“择校”是两个概念。“借读”和“择校”是指在某校计划招生数之外选择就读,区别于于借读一般发生在高中教育阶段,且一般来说借读生只是“借”一个学校学习,而学籍仍然留在原先录取的学校。

的孩子送往 N 市的县级四星级高中^①借读。笔者博士生阶段的一个老师就曾把他的孩子从省城送到了县城。他告诉笔者说,到了周末,会有近十辆大巴停在县城的中学门口,因为大巴司机知道学校里有不少城里的孩子要回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商机。而这些借读子女的来自城市的家长也因为要利用休息日时间去看望在县城读书的孩子经常往返于县城与省城之间而彼此熟识,甚至回到了城里彼此联系,形成了一个网络。笔者的这位老师的孩子已经从县城高中毕业,如愿以偿地考入省里的一所大学。很多从县城毕业的城市学生回到城市后还组建了县城学校校友会。除了老师的孩子的借读情况我很清楚,县城重点高中真的有那么多类似家庭背景的孩子吗?在城市里不少孩子选择出国留学或者在城里选择重点高中读书的当代教育“图腾”下,在媒体所宣传的“县中—应试教育”的渲染下,这些家长为什么还会选择把孩子从省城送到县城就读?他们前赴后继地把孩子送到县里的中学,是一种冲动的“跟风”还是在现实面前的理性选择?他们最终实现了对子女的教育目标吗?他们如果实现了对子女的教育目标,为何能够实现?这样的异地借读行为对当地县城及县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基于这样的现象和思考,一种特有的“社会学想象力”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这些城市子女的县城求学路与文章一开始所提到的高考扩招后高等院校里不同背景学生比例的变化之间有关联吗?这样的异地求学路是不是向我们展开了另一条理解诸如教育不平等现象的路径?也许,笔者应该循着这些家长为孩子所选择的求学之路,去真切地

① 四星级高中是 S 省评估院自 2003 年 7 月开始对普通高级中学实施的等级鉴定中的一种等级。这种星级评估是 S 省教育厅自 2003 年不再验收省重点中学而实施的一种新的评估方式。鉴定标准由低至高依次分为五个等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一星级为最基础级,五星级为最高级。普通高中申请接受某一星级标准的评估且获得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的星级称号。截至笔者调研时,S 省五星级高中空缺,四星级高中则为最高等级。

体会他们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是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 in 县城中学求学,如此才有助于揭开问题的面纱。更何况,这些由城市到县城借读的前赴后继的群体,无论是从时间跨度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至今)、空间距离上(城市至县城的距离为几十至几百千米不等)、借读人数上(按老师告诉我他孩子当时在县城借读的情形,如果按接送城里孩子的大巴车为十辆、平均每辆大巴车四十人计算的话,在一个县城的重点高中借读的城市学生至少在三四百人),还是身份特征上(城市家庭的孩子),似乎都表明这种由城市到县城借读的行为不是非理性选择,而是一个能够激起研究者兴趣从而进行进一步调查分析的研究课题。简言之,在社会结构转型和教育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异地借读现象的成因、运行机制和结果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第二节 研究背景

一、锦标式的高考

高考,即我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在我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也是一个我国民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高考作为一种竞争性很强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通过对知识、智力和技能的考量而体现其评价功能,决定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前途和命运。这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考试制度自 1952 年建立以来,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间断。直至 1977 年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一版上刊发的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以及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中断了 11 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如今,高考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举国大考”。国家建立与发展这种统一的考试制度旨在以最公平的方式使所有国民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进一步追求社会经

济地位,体现的是一种对公平的诉求、选择和追求。然而,尽管国家的初衷如此,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消除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才培养等造成的其他负面影响,伴随高考发展的几乎是从未停止过的批评和指责,乃至废除之声。

在我国高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可以说是使我国的高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1999年开始的高考扩招。自从1999年高考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惊人,采取的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模式: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从1998年的108.4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681.5万人,研究生招生数由1998年的7.3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56.02万人。普通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数在10余年间增长迅速。与这种超常增长速度相伴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9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022所,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目达到了2358所。^①

当然,随着1999年高考的扩招,被测试者的心理体验可以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扩招之前,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旦成功,相当于中彩,奔走相告,是“天之骄子”,“金榜题名”乃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扩招之后,考上大学似乎变成了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扩招之前,考不上大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扩招之后,考上大学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由于考上大学的参考基准相对提高才能足以满足人的心理追求。但是,这场战争的硝烟没有因此而消减。对个人来说,考上大学已经稀松平常,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关键;对各个高中学校来说,如果说过去互相竞争的是简单的升学率,那么如今的较量则相对集中在重点高校的录取率上,有的甚至是比哪所学校出来的地区状元多。因此,高考已经悄然从由一种不同层次

^① 徐魁鸿. 中国社区学院运行机制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150.

的价值主体共同追求的价值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图腾,转变成一场锦标赛、一场优中选优的竞赛。显然,它已不再是单纯的测试工具。

二、差异化的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教育发展的差异性仍然存在,这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特点。

首先,教育发展的最显著差异为城乡教育发展的差异。当然,这种城乡教育发展的差异主要是由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所造成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支撑。这种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几乎是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2倍,前者已达13年,而后者还不足7年。从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三项指标来看,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在教育经费方面,基础教育的经费指标,我国东部约是中部和西部之和的一到两倍。在各种指标当中,公用经费差距是最大的。中部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十分显著,有多种指标呈现出了中部凹陷的现象。长期以来,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向城市不遗余力地倾斜了一切公共资源,教育投入也是毫无例外地“以城市为中心”。我国的教育投入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的4%之下,远远低于5.1%的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有限的教育投入在分配上又存在着诸多不尽合理之处。2002年,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①

其次,教育发展的第二个差异化突出表现即为我国的重点学校政策。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兴办重点学校的要求。到1963年,27个

^① 时评:不要让农村孩子一直输在起跑线上[EB/OL]. (2005-02-14). <http://www.people.com.cn/GB/jiaoyu/1055/3180447.html>.

省、市、自治区共确定了487所重点中学,占公办学校的3.1%。“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技要发展,不抓教育是不行的……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现在看来,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落后了20年左右。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万……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在邓小平同志(1977年)这一讲话精神的要求下,教育部在1978年颁布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1980年颁布了《关于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其中确定重点中学4000多所,占全国中学总数的近4%,这一格局延续至今。直到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验收1000所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又对重点中学政策给予了强调。虽然近年来,重点学校被政府慢慢取消,但是,取代它的是示范性中学。实际上,从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通知》后,就在原有的重点高中的基础上改建成了示范性高中,旨在使这些高中在教育改革中起到示范、骨干和辐射作用,从而提高高中教育的整体水平,以更为全面的学校内涵来统领学校发展。按照《通知》规定:“校园占地面积,城市学校一般每生不少于25平方米,农村学校一般每生不少于3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城市学校一般每生不少于10平方米,农村学校一般每生不少于12平方米。”“位于城市市区的学校都有300米的操场跑道,位于其他地区的学校都有400米标准的环形跑道;有满足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需要的设施、器材。有条件的学校要有体育馆或风雨操场,游泳池或滑冰场。”对此高标准的建设要求,各地高中当时都努力创造条件进入示范性高中行列,以增强重点高中原有的优势。

正是这种教育发展的特征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差异性,也就是优

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李路路^①所说,代际社会地位的“直接再生产”的特征,即在改革开放之后,当资源配置的基础逐渐被市场机制所取代,教育成了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的“中介”。因此,李路路指出,教育的再生产职能在逐渐增强。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向深处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使得教育及其所生产的文化资本对所有精英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教育对社会流动越来越大的影响也为中下阶层向上流动和提升社会地位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所以,对于社会中下阶层来说,文化技术资源的获得就显得更为重要。与获得经济资源相比,高等教育使他们相对于非文化技术资源拥有者来说,其所拥有的文化技术资源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于经济资源的排他性优势。这样,就使得文化技术资源的获得和经济资源拥有之间呈现出较大的相关性,使得教育成了中下阶层向上流动、改变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②而对于社会优势阶层来说,由于相对稀缺的教育资源,所有的优势阶层都在试图控制并掌握优质教育资源,因此他们在教育获得上占有一定的优势,由此得以传承优势地位。^③

教育对于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的意义在我们的时代列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越发凸显。中国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文凭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认识到教育的投入对于后代的意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和其他流动手段的限制,为了实现各自对“公平”的诉求,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人们加强了对教育权的争夺与控制,教育机会的获得和资源的合理分配成为各阶层、各群体共同关注的极为敏感的社会公平问题。

① 李路路.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J]. 社会学研究, 2003(5).

② 顾欣炜, 于专宗. 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J]. 兰州学刊, 2004(5).

③ 郑辉, 李路路. 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J]. 社会学研究, 2009(6).